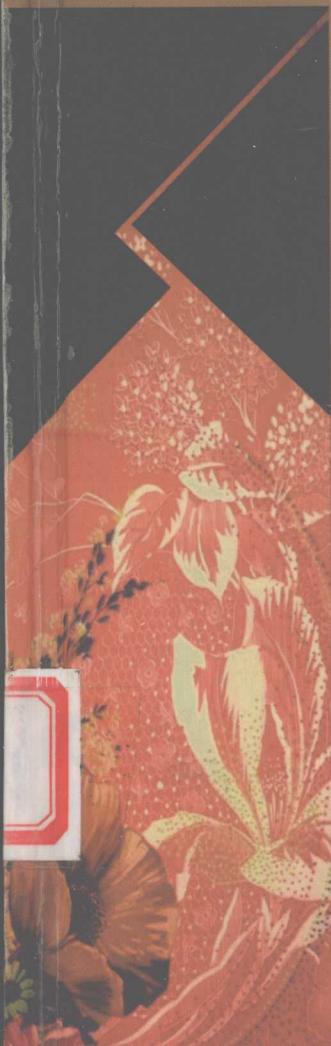


鲁迅

三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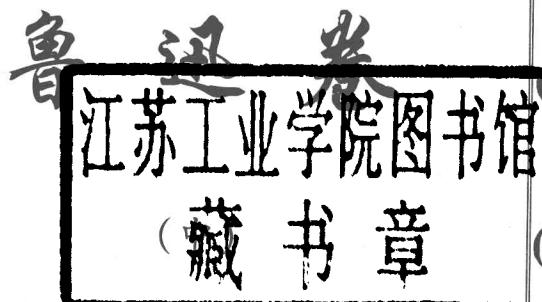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社



7216-1
48
28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7-6

I. 中… II. 姜…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38 号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1435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640.62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427-6/I·575 定价:5980.00 元(全 52 卷)



前 言

鲁迅（1881—1936），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幼年时多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17岁离家到南京求学，接受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02年赴日留学，在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时受到刺激，深感救治国民精神愚弱麻木的必需，毅然弃医从文。1909年鲁迅回到国内，在各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通过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思考，越发认识到思想革命的迫切。新文化运动突起，鲁迅即站到运动的前列，并于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实质，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鲁迅虽深感“荷戟独彷徨”的悲凉，但他依然积极地在文化战线上奋战，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中，鲁迅都坚决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并为之呼号呐喊。1927年为避军阀迫害，加之个人爱情生活原因，鲁迅偕许广平辗转广州最终定居上海。三十年代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入侵和蒋介石的对内残暴统治，鲁迅仍屹立在斗争前沿，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与各种反动思潮进行最坚决地战斗。1936年，鲁迅因病与世长辞，全国震悼。

鲁迅一生写了大量杂文，自编或他人为之编订的杂文集共计16部，占据鲁迅全部作品的最大比重。鲁迅的杂



三闲集

文创作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18—1925年可称为形成期。这一时期正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期。鲁迅这时的杂文多是针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思想观念而发，带有形成期的明显特征，《坟》中的杂文更接近于“论”，以细密的逻辑层层推进，说理充分；而《热风》中的杂文则更接近“感”，直抒胸臆，情感性的特征也更明显。1925—1927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发展期，这时的杂文更多是围绕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写成的，并有了像章士钊、陈西滢这样比较集中的目标，文章对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已经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作者思想的尖锐性与深刻性也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自由地运用多种形式而又赋予杂文文体统一的特征，这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有了充分的验证。1927年以后的杂文创作则可以统归为鲁迅杂文的成熟期。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建立，把自由民主的最后一点遮羞布也撕得粉碎。鲁迅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对国民党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态度中感受到中国各种思想和言论的性质，从而使其杂文有了更广阔丰富的内容，也有了更凝聚的视点。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批判各种面目的资产阶级文艺流派，并对各种文坛小丑进行了尖利的讽刺和批评。鲁迅把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生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用强烈的主体意识记录客观事实。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鲁迅的杂文堪称中国现代史诗性的作品，它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中国社会思想的百科全书。本库收录了鲁迅散文，主要是杂文创作的精品，从中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想现象。



目 录

且介亭杂文

序言	(3)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6)
答国际文学社问	(17)
《草鞋脚》小引	(19)
论“旧形式的采用”	(21)
连环图画琐谈	(26)
儒术	(28)
《看图识字》	(33)
拿来主义	(36)
隔膜	(39)
《木刻纪程》小引	(45)
难行和不信	(48)
买《小学大全》记	(51)
韦素园墓记	(60)
忆韦素园君	(61)
忆刘半农君	(68)
答曹聚仁先生信	(73)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77)
门外文谈	(81)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108)
中国语文的新生	(111)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14)



三闲集

“以眼还眼”	(117)
说“面子”	(123)
运命	(127)
脸谱臆测	(130)
随便翻翻	(133)
拿破仑与隋那	(139)
答《戏》周刊编者信	(141)
寄《戏》周刊编者信	(147)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49)
关于新文字	(157)
病后杂谈	(159)
病后杂谈之余	(177)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194)
阿金	(196)
论俗人应避雅人	(201)
附记	(205)

三闲集

序言	(215)
一九二七年	(223)
无声的中国	(223)
怎么写	(230)
在钟楼上	(241)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251)
匪笔三篇	(254)
某笔两篇	(260)
述香港恭祝圣诞	(263)
吊与贺	(268)



一九二八年	(272)
“醉眼”中的朦胧	(272)
看司徒乔君的画	(283)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285)
文艺与革命	(288)
扁	(297)
路	(298)
头	(300)
通信	(303)
太平歌诀	(312)
铲共大观	(314)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317)
革命咖啡店	(325)
文坛的掌故	(329)
文学的阶级性	(334)
一九二九年	(337)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337)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340)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342)
“皇汉医学”	(348)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351)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354)
柔石作《二月》小引	(357)
《小彼得》译本序	(359)
流氓的变迁	(36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367)
书籍和财色	(369)
我和《语丝》的始终	(372)

且介亭杂文



序 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1]，前“第三种人”^[2]施蛰存^[3]和杜衡即苏汶^[4]，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5]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6]，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



史^[7]，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8]。

注 释：

[1]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2] “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七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3] 施蛰存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4] 杜衡（1906—1964）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



的局势”。

[5] 林希隽 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6] “死之说教者” 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7] 诗史 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8] 且介亭 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

一 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2]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3]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4]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5]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6]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为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



可怕的行动的。^[7]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8]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9]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10]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11]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放火的名人项羽^[12]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13]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二 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14]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15]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16]，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



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17]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汉的高祖^[18]，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19]，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20]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21]，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22]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为“顽民”^[23]，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24]，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